

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的 量化分析^{*}

山本美智子 张 玮◎

【内容摘要】 本文在对战后中日政治经济关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选择“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着重对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基于定量研究结果进行了定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中日经济关系存在由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因素决定的“阶段”属性，政治关系等其他因素只能在此属性基础上对中日经济关系发挥影响；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温差的出现及变化遵循以上规律；被认为是中日政经关系常态的“政冷经热”只是小泉时期的特殊现象，而学界一直担心的“政冷经冷”现象直到2012年才真正发生；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仅是“政冷经冷”出现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是中日经济关系的整体下滑。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政冷经热 政冷经冷 政经温差 定量分析

【作者介绍】 山本美智子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1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koisuruhiyoko12@163.com。

张玮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1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zhangwei211210@163.com。

* 本文受到王雪莲教育基金的资助。

一 引言

每当谈到中日关系，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总是“政冷经热”这个词语。政治关系冷淡，经济关系火热，政治经济关系存在巨大温差的现象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理论和人们的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正常现象”，因此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媒体舆论都非常关注这一现象。这种认识在中日两国社会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2012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事件的发生致使中日政治经济关系面临“政冷经冷”的风险时，人们是如此不适应。

虽然从2006年起便有一些有识之士担心中日两国负面发展的政治关系最终会影响经济关系，进而引发“政冷经凉”或“政冷经冷”现象，但这种担忧一直没有出现。另外，人们也很难真正相信，在小泉首相时代政治关系降到冰点时经济关系都能火热发展的中日关系真的会出现“政冷经冷”的极端局面。当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事件发生后，人们对中日之间是否真的出现了“政冷经冷”现象感到不确定，或是普遍认为这次“政冷经冷”现象只是因为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行为过于激进而造成的。因此，两国社会都有声音呼吁本国政府尽快改善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抗态势，从而消除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不利影响。2013年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也想通过重提“政经分离”，以“重温中日之间曾经一度出现的政冷经热的状态”^①。

长期以来，人们在对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温差现象的认识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对中日政治和经济关系互不影响充满不解，这一观点以“政冷经热”派为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政治关系中的对抗并没有影响经济

^① 石岩：《安倍政经分离思维将影响中日经济合作》，中国新闻网，2013年8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8-08/5138911.shtml>。

关系的火热发展,经济关系的火热发展也没有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另一种则担心政治关系的冷淡最终会对经济关系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每当中日两国发生重大的政治负面事件时,这种担忧便会上升。因此,当 2012 年中日政经关系出现“政冷经冷”现象后,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认为这是受日本“购岛”事件的不良影响。

本文在对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对冷战后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温差进行了系统的定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定位,得到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可能对以上两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更具体的是,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政冷经热”是否真的和人们印象中的一样,一直是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常态?不时被人们提起的“政冷经冷”现象在冷战后的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中究竟有没有出现过,如果有,一共有几次?“政冷经热”“政冷经冷”等中日关系温差的成因究竟是什么?中日间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有时政治经济互不干扰,有时又会产生影响?

二 对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温差的新认识

(一) 学界对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温差的认识

由于中日政经温差的长期存在,人们几乎已经把这种反常的现象当作了正常现象,以至于之前每当提起中日关系,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便是“政冷经热”这个词汇。这也是为什么 2012 年日本政府“购岛”事件发生后“政冷经冷”现象的出现如此吸引中日两国各界关注的原因。相较于大家都已习惯的“政冷经热”状态,“政冷经冷”的出现反而显得“异常”和突兀。

实际上,中日两国各界对中日政经关系温差现象的关注、认识和研究

由来已久，并且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们以“政冷经热”这一概念描述中日关系的新特点始于1995—1996年。笔者看到的这一概念的提法最早出现在刘江永教授的研究中，他于1996年10月19日在与前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等人讨论中日关系时便指出，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可能使中日关系出现经济关系热、政治关系冷。1997年5月，他在中日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进一步指出：“中日关系出现这种‘经热政冷’现象，构成了1995年以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这一阶段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①但是，这一概念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甚至刘江永教授本人也因为之后中日政治关系有所改善而没有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深入下去。

进入21世纪以后，受小泉首相执政期间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等因素的干扰，中日政治关系持续下降，而中日经贸关系则持续上升，民间的资金合作也继续加强。21世纪的前4年，中日之间再次开始持续呈现出“政冷”情况下的“经热”现象，并引起了中日两国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冷经热”的概念再次被中国学者提起。在中国知网可以检索到的第一篇提及“政冷经热”概念的学术研究论文出现在2003年，是冯昭奎的《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②，而第一篇明确以“政冷经热”为题的学术论文是徐长文2004年7月发表的《政治冷经济亦不热——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政冷经热”现象分析》^③。从2005年起，两国学界对中日间的“政冷经热”现象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相比于2003年的1篇与2004年的3篇，2005年在中国知网可以看到的25篇相关研究与报道不能不算是大幅增加。而自此以后，除了以“政冷经热”为题的专门性研究外，几乎所有关于中日政经关系的研究都会涉及这

①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2—3页。

② 冯昭奎：《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③ 徐长文：《政治冷经济亦不热——中日两国关系中“政冷经热”现象分析》，《国际贸易》2004年第7期。

一概念。与此同时,这一概念也通过媒体的传播^①在中日两国变得深入人心,以至于让人几乎相信“政冷经热”就是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特有的永恒主题。

由于小泉任内不断地在右翼教科书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国军事威胁论”、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上为中日政治关系制造麻烦,特别是 2005 年 4 月中国爆发了针对日本“入常”和“右翼教科书”等问题的大规模反日游行,2006 年中日两国出现了对可能发生的“政冷经凉”“政冷经冷”现象的担忧。中国方面的关注体现在张季风的《当心“政冷经热”走向“政冷经凉”》^②、冯昭奎的《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再思考》^③、胡静莹的《近年中日贸易“政冷经凉”趋势分析》^④等报道或研究中,而 2006 年 1 月 9 日王小波在《经济参考报》撰写的《中日博弈“政冷经冷”底线》则是其中最早的。在日本方面,同样的关注在《贸易黑字的扩大与对日贸易占比下跌的苦恼》^⑤《小泉首相对历史遗留什么》^⑥等研究或报道中也有所体现。不过,这些担忧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在之后的几年中也很少被人提起。

然而,随着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的发生,以及中日间“政冷经冷”现象的出现并持续发展,“政冷经冷”突然成为中日两国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目前在百度搜索中文“政冷经冷”及在雅虎日本搜索日文“政冷経冷”,分别可以得到 18.5 万以及 39.7 万个检索结果,这些内容基本上是 2012 年 9 月以后出现的。中日媒体和经济界人士

① [日]《日中関係:「政冷経熱」懸念、自国マスコミにも注文》,Searchina 网,2004 年 9 月 7 日, http://news.searchchina.ne.jp/dispatch.cgi?y=2004&d=0907&f=politics_0907_003.shtml。

② 张季风:《当心“政冷经热”走向“政冷经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 年 1 月 27 日。

③ 冯昭奎:《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再思考》,《日本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④ 胡静莹:《近年中日贸易“政冷经凉”趋势分析》,《当代经理人》2006 年第 13 期。

⑤ [日]《悩む貿易黒字の拡大と低下する対日貿易のシェア》,Chase China and Asia 网,2006 年 5 月 24 日, <http://chasechina.jp/reports/chinabiz/trade/596.html>。

⑥ [日]《小泉首相は歴史に何を残すのか》,2006 年 1 月 10 日, <http://www.yoshida-yasuhiko.com/northkorea/post-151.html>。

开始谈论“政冷经冷”的危害^①，并呼吁中日政府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以结束这种不利情况。

（二）关于学界不同时期对中日政经关系温差认识的评述

不难发现，冷战后两国学界及社会对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温差的认识大致经历了4次变化：1996—1997年，中国学界首次提出了“政冷经热”概念；2004—2005年，“政冷经热”概念再次被提起，并迅速在中国学界达成共识，经过政府和媒体舆论的传播渲染，逐渐成为中日两国对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模式的普遍认识，并深入人心持续至今；2006年，中日学界出现对可能发生“政冷经凉”“政冷经冷”现象的担心，但其没有影响两国社会对“政冷经热”现象的普遍认识，并且这种担忧在学术上也没有进一步持续；2012年之后，“政冷经冷”现象成为中日两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这4次认识上的变化，前文对冷战后中日政治经济温差所做的分析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和一些独特的认识思考。

首先，“政冷经热”概念1996年被首次提出时的实际表述其实是“经热政冷”。

这一概念提出的目的和意义与“政冷经热”4个字本身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同的。“经热政冷”这一概念的提出，不是对当时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模式的客观总结，而更多的是对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破坏中日政治关系行为的反应和对中日经济关系造成冲击的担忧。

从1992年至2000年中日政经关系温差的变化脉络来看（见表1），这段时期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在整体上是沒有温差的，并大体可以看作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同向正向发展的阶段，如果用温差法表示的话，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政热经热”。具体而言，在政治方面，除了1996年外，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出现“政冷”或“政凉”，而大部分为

^① [日]《「政冷經寒」の時代へ、日本に試練中国、暴走する反日》，2012年9月24日，<http://business.nikkeibp.co.jp/article/topics/20120921/237108/?rt=ocnt>。

表 1 1992—2000 年中日政经关系温差一览

单位：人次，%

1992	政热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4	8	12
	经热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25.0	113.6	167.9
1993	政热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1	7	10
	经热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53.9	296.2	36.4
1994	政热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3	8	13
	经热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22.8	109.1	50.0
1995	政热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3	6	10
	经热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20.0	107.0	70.9
1996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0	2	3
	经凉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4.5	140.6	-32.4
1997	政温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2	6	8
	经凉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1.2	9.8	-33.7
1998	政温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1	5	11
	经冷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4.7	—	-20.6
1999	政热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3	5	15
	经温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14.2	125.7	-4.1
2000	政热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1	6	12
	经热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25.7	81.6	42.1

资料来源：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 61 页；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的《中国外交》年鉴及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其出版物《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商务部网站。

“政热”，伴随着两年的政温。在经济关系方面，除 1996、1997、1998 三年外，“经热”一直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常态。而这三年，中日经济关系之所以没有良好表现，更主要的是受 1996 年中国最后一次核试验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台海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冲击，以及 1998 年前后亚洲金融风暴等外部事件和环境的影响，而非中日经济关系自身存在问题。

在“经热政冷”概念提出的 1996 年 10 月，实际当年的中日政经关系是“政冷经凉”状态。因此，1996 年出现的“经热政冷”提法的侧重点应该在“政冷”两个字上，这实际上是基于对冷战后至 1996 年前中日经济往来火热状态的感知，对 1996 年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以中日钓鱼岛纷争为焦点的一系列中日政治摩擦的担忧。

不得不说的是，虽然冷战后中日两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开始凸显，但在 2000 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中日两国的政治往来还是比较顺畅和频繁的，至少从指标上不能判断为“政冷”。“经热政冷”提法所反映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温差，在冷战后至 21 世纪之前，包括 1996、1997 年，客观上都是不存在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1996 年“政冷经热”的概念被提出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学者也没将这一研究继续下去。^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桥本龙太郎及其后任小渊惠三这些原属自民党保守势力中“田中角荣派”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妥善处理了个人感情与中日两国感情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其间对“政冷经热”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

然而，自 2000 年自民党内原“岸信介派”的政治继承人森喜朗接替突然病逝的小渊惠三首相执政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权就开始被原自民党内“反中反共”派系，即右派所掌控。除 2009—2012 年以外，日本首相均由自民党内的原“岸信介派”出身的政客担任。这也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一种表现。结果，中国学者曾经担心的“政冷经热”现象在 2001 年小泉纯一郎执政之后便明显出现了。

①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 3—4 页。

其次，“政冷经热”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中日政治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特殊温差现象。

“政冷经热”概念仅是对这一时期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模式的特定总结。可以说，2004 年前后“政冷经热”提法的再次出现，确实抓住了当时中日政经关系的实质。根据表 2，2001—2005 年，中日政治关系都呈现出明显的“政冷”状态，而经济关系则呈现出明显的温热状态，其中 2003、2004 两年，中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模式更是典型的“政冷经热”状态。也正是由于 21 世纪前 5 年里中日两国政经关系中这种特殊温差现象的

表 2 2001—2005 年中日政经关系温差一览

单位：人次，%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1	1	5
2001	政冷			
	经温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2002	政冷	5.5	73.3	47.3
	经温			
2003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经热	1	1	3
2004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经热	16.1	73.9	-2.2
2005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经温	1	1	5
2006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经热	31.1	83.8	50.2
2007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经热	25.7	72.0	14.6
2008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经温	0	3	5
2009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经温	9.9	42.7	30.7

资料来源：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 61 页；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的《中国外交》年鉴及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其出版物《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商务部网站。

持续存在，以及政府和媒体（特别是中国方面）对“政冷经热”这一准确概括该时期中日政经关系事实的概念的反复渲染，使得自2004年以后“政冷经热”几乎成为中日两国社会里中日关系的代名词。直到现在，每当提到中日关系，人们都很容易想到这个词语。

虽然“政冷经热”这个概念从2004年出现至今已经深入人心，但若以本文的定量研究结果为依据（见表3），实际上2005年以后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基本没有再表现出“政冷经热”的现象。2006—2011年，中日经济关系基本表现为“经温”状态，而政治关系则各有冷暖，但总体上经历了升温变热后又逐渐转凉的过程。因此，虽然“政冷经热”的提法和印象在中日两国社会里延续至今，但客观而言这一概念只是与小泉首相执政时期的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温差对应，而人们印象中的中日关系并非始终如此。

最后，2012年的“政冷经冷”是这一现象在冷战后的首次出现。

虽然从2006年起，学界便对中日政经关系出现“政冷经凉”“政冷经冷”现象的可能性充满担心，但从笔者对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温差进行的定量研究所得的结果来看（见表3），直到2011年，中日的经济关系都基本保持了温热的状态，唯一出现“经冷”的年份是2009年，但这主要是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且在全球经济有所好转的2010年实现了对2009年的补偿式发展。在政治方面，2005年以后、2012年以前，客观而言，所谓的“政冷”也并没有真正出现，不过这一时期的中日政治关系变化以2008年为界，分别呈现出上升与下降的两种趋势，尤其是2009年以后，中日政治关系一直处于下降之中，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近两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政冷”状态。但是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事件发生后，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确实如人们所感知的那样，进入了“政冷经冷”时期，并至今仍在持续。这是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第一次呈现出“政冷经冷”状态，此前最接近此状态的是1996年的“政冷经凉”。

表 3 2006—2013 年中日政经关系温差一览

单位：人次，%

2006	政温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3	3	3
	经温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
		12.4	52.1	-16.9
2007	政热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4	6	11
	经温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实际投入金额增长率
		13.8	58.7	-24.6
2008	政热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3	5	10
	经温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实际投入金额增长率
		13.0	72.6	1.7
2009	政温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1	5	7
	经冷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实际投入金额增长率
		-14.2	—	12.3
2010	政凉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1	3	3
	经热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实际投入金额增长率
		30.2	87.0	-0.5
2011	政凉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1	2	5
	经温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实际投入金额增长率
		15.1	67.1	55.1
2012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1	1	2
	经冷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实际投入金额增长率
		-3.9	—	16.1
2013	政冷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0	0	0
	经冷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投资实际投入金额增长率
		-5.1	—	-3.9

资料来源：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 61 页；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的《中国外交》年鉴及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其出版物《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商务部网站。

三 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梳理

要理解冷战后的中日政经关系，我们有必要对中日关系进行简要回顾。整体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至 21 世纪初，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经历了良好发展时期、“政冷经热”时期和现在的“政冷经冷”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两国经历了一段政治经济都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由于 1972 年为了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之间还是遗留了多种政治问题，如钓鱼岛海域的领土争端，同时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现象明显，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给中日两国造成政治困扰，而这些政治问题也不时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冷战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中出现了“政冷经热”等许多奇怪现象。在此笔者将把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大致按年代来进行动态的梳理，并使用中日贸易额、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国家的好感度等统计数据予以直观展示。

（一）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日政经关系

在 1982 年铃木内阁时期出现了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方受到中国的强烈抗议并引起了中日政治摩擦。虽然 1982 年 8 月 26 日日方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了关于“历史教科书”的谈话^①，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也于同年 9 月 26 日访华，对教科书问题进行解释并取得了中方一定的理解，但中日政治摩擦还是对中日贸易有所影响。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1982 年日本对华出口减少了 31.1%，两国贸易总额也减少了 14.7%（见图 1）。从 1983 年开始，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又回到良好状态。1984 年 3 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与中国达成了第二批日本对华

^① [日]《「歴史教科書」に関する宮沢内閣官房長官談話》，日本外务省网站，1982 年 8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miyazawa.html>。

政府开发援助的协议。在中日民间交流方面，1983 年 9 月 3000 名日本青年应胡耀邦总书记和中国青联邀请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日友好医院也于同年 10 月正式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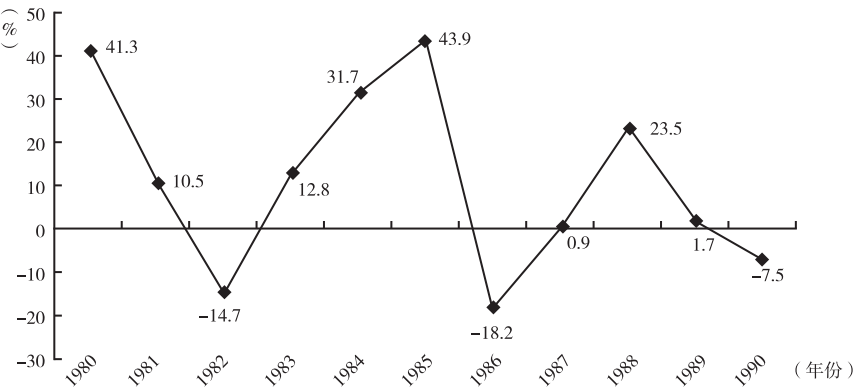


图 1 1980—1990 年中日贸易增长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资料整理。

1988 年 8 月日本首相竹下登访华时表示，将对华提供总额为 8100 亿日元的第三批政府援助贷款。这一年，中日的政治经济关系都恢复到了良好的水平。但 1989 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采取了对华经济制裁措施，如冻结第三批日元贷款，对华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提高对华出口保险费用等，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出口的大幅度下降。^① 具体而言，日本对华出口增长率在 1989 年下降了 10.1%，1990 年又下降了 28%，日本对华贸易逆差也由 1989 年的约 26 亿美元扩大到了 1990 年的约 59 亿美元（见表 4）。

1990 年 7 月日本率先宣布将解除对华制裁后，11 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同年 12 月，中日自 1978 年签订《中日长期贸易协议》以来第三次续签了该协议。一直以来，这一协议在通过促进中日贸

①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 55 页。

表 4 1980—1990 年日本与中国大陆贸易统计

单位：千美元，%

年份	日本对华出口		日本对华进口		贸易总额		贸易收支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1980	5078335	37.3	4323374	46.3	9401709	41.3	754961
1981	5095452	0.3	5291809	22.4	10387261	10.5	-196357
1982	3510825	-31.1	5352417	1.1	8863242	-14.7	-1841597
1983	4912334	39.9	5087357	-5.0	9999691	12.8	-175023
1984	7216712	46.9	5957607	17.1	13174319	31.7	1259105
1985	12477446	72.9	6482686	8.8	18960132	43.9	5994760
1986	9856178	-21.0	5652351	-12.8	15508529	-18.2	4203827
1987	8249794	-16.3	7401429	30.9	15651223	0.9	848365
1988	9475987	14.9	9858823	33.2	19334810	23.5	-382836
1989	8515888	-10.1	11145762	13.1	19661650	1.7	-2629874
1990	6129532	-28.0	12053517	8.1	18183049	-7.5	-5923985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资料整理。

易满足日本对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和中国对设备与技术的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协议框架下，1991—1995 年中日各自的出口金额约 80 亿美元，其中中国主要对日出口原油、炼焦煤、动力煤等，日本主要对华出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建设器材等。^①

1991 年 8 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他是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首脑之中第一位到中国访问的领导人，同时他还决定恢复日本对华援助。海部内阁对中国奉行的积极政策使中日经贸关系开始逐渐回温。1992 年 1 月邓小平南行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进行了再次确认，此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逐渐提高。199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之际，江泽民在 4 月访问日本时同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再次确认了搁置钓鱼岛争议的原则，并邀请日本天皇访问中国。同年 10 月 23 日，

① 石其宝：《〈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发展历程》，《现代日本经济》2006 年第 5 期。

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应邀正式访华。这是中日 2000 余年的交往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华,并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也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①从1993 年开始,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日方统计,当年中国对日出口约 206 亿美元,中日贸易总额达 378 亿美元。

1994 年 1 月,日本副首相羽田孜访华时决定,在之后的三年中向中国提供第四批对华日元贷款中的 5800 亿日元。1995 年 5 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并参观了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年 8 月 15 日,村山首相在二战结束 50 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谈话,并被称为“村山谈话”^②。此谈话也被之后的历届日本首相所继承。1991—1995 年,中日政治关系一片祥和,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可以说是非常顺利,1995 年中日贸易总额已达 578 亿美元。但之后由于 1995、1996 年中国进行核试验,日本在对华进行抗议的同时一度冻结或通知冻结了对华无偿援助,1997 年则发生了 4 名日本国会议员登上钓鱼岛进行主权宣示的事件,而此前不久在会见桥本龙太郎时,江泽民还表示解决钓鱼岛问题仍然需要时间。

1997 年 7 月开始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影响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小,但其对中日经贸方面的影响仍然未能完全避免,1998 年中日贸易总额增长率下降了 10.9% (见图 2)。但在之后的 1999 年和 2000 年,中日经贸关系迅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此外,1998 年 11 月江泽民访日时,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共同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1999 年 7—11 月,为纪念《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缔结 20 周年、中国建国 50 周年,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友好年”活动。

① 《日本天皇访华》,中国网,2002 年 4 月 19 日,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04/19/content_5135400.htm。

② [日] 村山富市:《戦後 50 年に当たっての村山内閣総理大臣の談話及び記者会見》,《村山演说集》,日本広報协会,1998,第 317—3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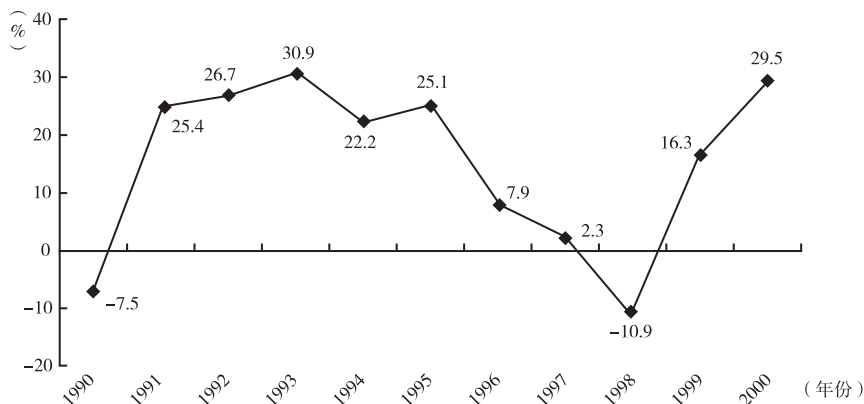


图2 1990—2000 年中日贸易增长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整理。

(二) 21 世纪以后的中日政经关系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 2001 年 4 月上台，8 月 13 日便参拜了靖国神社。他在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便对民众表明，若能当选日本首相则一定会参拜靖国神社。2001 年 10 月 8 日，小泉对华进行工作访问，参观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表示歉意，并同江泽民和朱镕基实现了会谈，^①但在 10 月 22 日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对华经济合作计划里却包含了将递减对华日元贷款的内容。

2002 年 9 月 29 日，中日双方都进行了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的纪念活动，但由于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拒绝他到中国参加纪念典礼，从此以后小泉再也没有访问中国，而中日政治关系也一步步恶化。2004 年 1 月 1 日，小泉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方的抗议。3 月中国民间人士登临钓鱼岛后被日本警察逮捕，5 月出现东海油气田问题，7 月在中国举行亚洲杯足球比赛时也发生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遭到中国观众

^① [日]《小泉内閣総理大臣の中国訪問》，日本外务省网站，2001 年 10 月 8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china0110/gh.html。

起哄的事件。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的中日两国的政治矛盾转化为中国部分民众的反日情绪。2004 年 11 月,胡锦涛和小泉在智利会见后,小泉对媒体表示日本永远不会与中国发生战争,并对中日双边关系在经贸领域的迅速发展感到满意。^①在小泉首相执政前半期,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确实没有受到政治问题的明显影响,甚至在 2004 年中国(含香港)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据日方统计,2004 年日本对华出口 738 亿美元、进口 942 亿美元,中日贸易总额达 1680 亿美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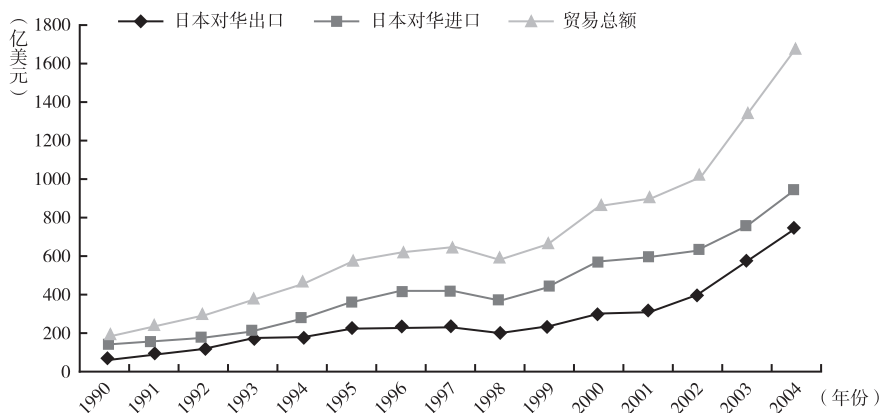


图 3 1990—2004 年中日贸易金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整理。

2005 年,日本国内发生历史教科书问题,在国际方面也在进行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尝试。由于小泉首相执政以来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的积累,最终引发了中国各大城市的涉日游行,一些人甚至出现过激行为,而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尝试也最终因为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反对而没能成功。在此期间,日本一些国会议员也曾劝小泉首相和中国改善政治关系,但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

^① 《2004 年 11 月 22 日:胡锦涛主席在智利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中广网,2008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cnr.cn/2008zt/hjtfr/xwrl/lshg/200804/t20080429_504775746.html。

2005 年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及反日运动对中日货物贸易基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相较于 2000 年以来的增加趋势,2005 年以后项目数开始连续 5 年下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新增合同项目最多的是 2004 年的 3454 个,此后 2005 年是 3269 个,比上年下降了 5.4%。2006 年又下降了 20.8%,到 2009 年新增合同项目已经只有 1275 个(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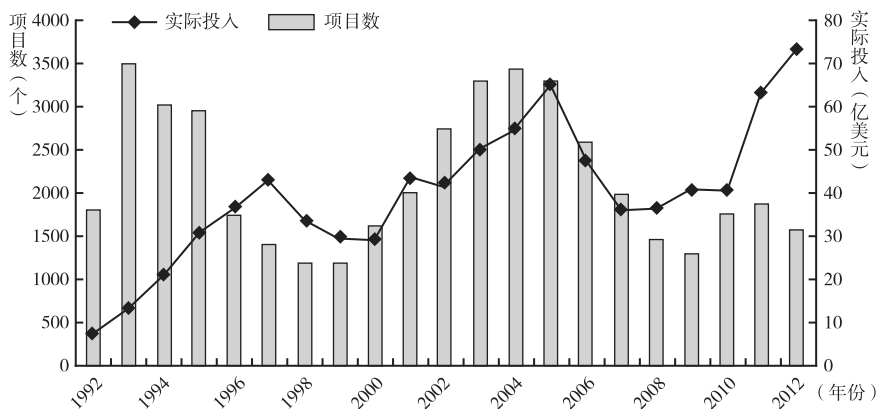


图 4 1992—2012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整理。

2006 年 8 月 15 日,小泉纯一郎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于 9 月 26 日下台。安倍晋三上任后,为了同中国改善政治关系,在同年 10 月 8 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同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实现了会谈。由于在此次会谈中日本新政府表现出来的对华积极态度,中国方面对安倍的评价也较高。

2007 年年底,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被称为“迎春之旅”^①。连续两年的日本首相访华,使得自小泉首相执政以来日益冷淡的中日政治关系

^① 《国际问题专家刘江永:福田访华的“迎春之旅”》,中国新闻网,2007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kong/news/2007/12-28/1117311.shtml>。

有了改善的征兆。但不幸的是，2008 年 1 月发生了“冷冻毒饺子”事件。此后，日本人对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开始有所抵触。

从 2008 年开始，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附近的冲突偶有发生。2010 年 9 月 7 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和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从此钓鱼岛矛盾越来越成为中日两国在政治上面临的棘手问题。因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权之争，日本认为可以使用日本法律来解决撞船事件，而中国则主张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没有权力扣留中方船长。之后，为了迫使日本政府释放船长，中国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如停止中日部长级来往、中止增加飞机班次的谈判、延期煤炭会议、暂缓邀请日本大学生参观上海世博会、在石家庄以不经批准就拍摄军事管理区为由逮捕了 4 名涉嫌从事非法活动的日本人以及部分企业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等。此后，日本媒体关于日本企业“离开中国”的讨论逐渐增多。中日两国民众彼此的亲近感进一步下降（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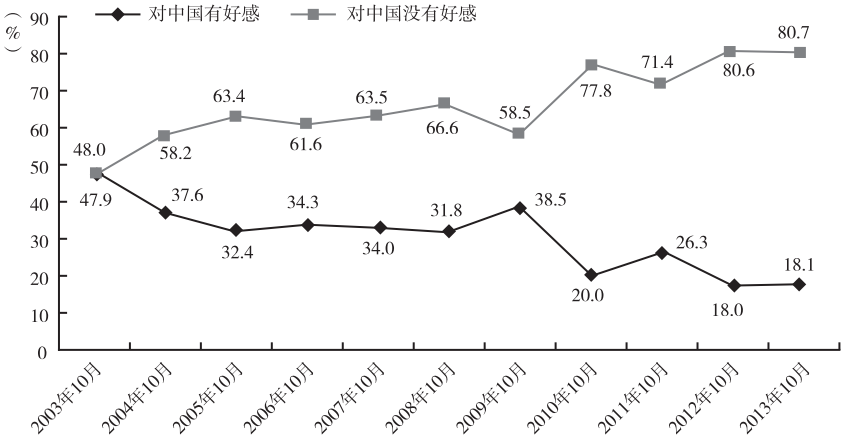


图 5 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中的统计数据整理。^①

^① 《日本与中国——对中国的亲近感》，《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www8.cao.go.jp/survey/h25/h25-gaiko/zh/z10.html>。

撞船事件确实对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但 2008 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更大。据日方统计，2009 年中日贸易总额比上年下跌了 12.8%。不过，随着金融危机的缓解，2010 年中日经济关系出现明显而强烈的反弹，2010 年日本对华出口增长率是 36%，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率则达 24.7%，贸易总额增长率则是 30%，这是 21 世纪以来仅次于 2003 年的次高值。2011 年，中日的贸易总额增长率也有 14.3%（见图 6）。因此可以说，2010 年的撞船事件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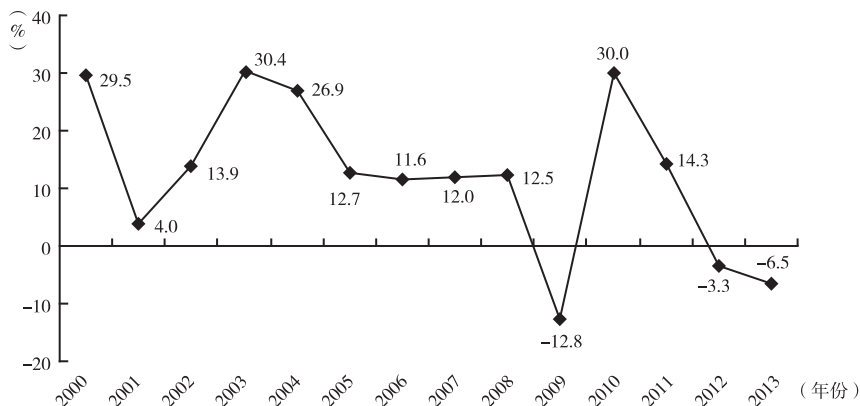


图 6 2000—2013 年中日贸易增长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资料整理。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对日本的救灾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到灾区进行慰问。但很可惜，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中日关系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2012 年 4 月 16 日，日本东京都前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将购买“尖阁列岛”（即钓鱼岛）。为了保持中日两国关系及稳妥管理“尖阁列岛”，7 月 7 日野田内阁宣布日本政府将国有化“尖阁列岛”。同年 9 月 11 日，日本政府以 20.5 亿日元向拥有“所有权者”购买了钓鱼岛、北小

岛、南小岛三个岛屿。从此以后，中日双方在钓鱼岛海域附近开始了舰船和飞机的对峙。中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和抵制日货呼声，再度发生一些激进行为。这种激进行为虽然受到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谴责，但难以挽回其在日本造成的负面影响。

2012 年 12 月 26 日，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试图改善中日关系现状。2013 年 1 月 25 日，日本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访华，并在与习近平会见时递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但此后因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找到缓解矛盾的办法，中日政治关系一直没有发生任何积极的改变，中日首脑会谈至今也还没有实现。2013 年 12 月 26 日，安倍首相在他再度任职日本首相一周年之际第一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行为不仅遭到中国的抗议，美国也立即对此表示失望。^①

在经济关系方面，2012 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发生后，安倍首相所主张和期待的“政经分离”情况并没有出现。相反，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首次表现出“政冷经冷”的特点。2012 年，日本对华出口下降 10.4%，中日贸易总额为 3337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3.3%；2013 年日本对华出口又下降 10.3%，对华进口也下降了 3.6%。中日贸易总额比上年又下降 6.5%（见图 6）。

四 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温差的定量研究

通过对中日政经关系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自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几经寒暑，其间既有邦交正常化初期的“蜜月期”，也有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造成的“寒冰期”，而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却保持了总体上升的趋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1972 年以及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 1978 年，中日间的贸易总额分别只

① [日]《米政権「失望している」首相靖国参拜で異例の批判声明》，朝日新闻网，2013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F0TKY201312260172.html>。

有 11 亿美元和 66 亿美元,^① 而到 2013 年已达到 3126 亿美元。^② 其间, 在 1993 年至 2003 年的 11 年间, 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 中国也一度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③ 因此, 在小泉执政时期, 每当谈到中日关系时, 几乎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政冷经热”这个词, 尤其是中日政治关系明显持续低迷时。但是, 这只是人们对中日关系最直接的感性认识。

虽然“政冷经热”的概念广为人知, 但中日政经关系实际上并不总是这样的, 政治、经济的“冷、热、凉、温”组合而成的不同模式都是可能存在的。此外, 对于同一年的中日政经关系, 一些观察者认为是“政冷经冷”^④, 而另一些观察者则可能认为是“政冷经凉”^⑤。这种对中日政经关系基于表象的认识的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准确性。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主观性的避免来实现对准确性的追求, 因此采用基于事实和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基础。

(一) 中日政经关系定量分析的模型选择

目前, 中日关系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并不多, 一些所谓的“评估”^⑥ 实际上也只是对中日政经关系史的梳理。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 笔者认为刘江永教授于 2007 年在其著作《中国与日本: 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提出的“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⑦ 对本文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中日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搜狐网, 2007 年 8 月 23 日, <http://business.sohu.com/20070823/n251742592.shtml>。

②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 2014 (日本篇)》, 商务部网站, 2014 年 4 月, <http://images.mofcom.gov.cn/jcj/201404/20140417093059728.pdf>。

③ 《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震后中日贸易直接打击有限》, 金融界网站, 2011 年 3 月 22 日, <http://finance.jrj.com.cn/2011/03/2211379526967.shtml>。

④ 王小波:《中日博弈“政冷经冷”底线》,《经济参考报》2006 年 1 月 9 日, 第 2 版。

⑤ 胡静莹:《近年中日贸易“政冷经凉”趋势分析》,《当代经理人》2006 年第 13 期。

⑥ 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 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日本学刊》2009 年第 5 期。

⑦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 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 第 63 页。

这既是因为该衡量法是专门为解释中日关系“政经分离”特殊现象而设计的，同时该衡量法从 2007 年提出后也经过了时间与实践的检验，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质疑。

“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主要特点是将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别选取指标进行定性衡量，然后将其结果进行组合，进而完成对政治经济关系的复合定位。具体操作中，在政治关系衡量方面，这一方法选取的主要指标是各级高层互访的次数，主要对总理级以上、副总理级以上以及部长级以上的互访进行统计，并设定与政治关系冷热程度对应的参照值表（见表 5），进而对不同年份的政治关系做出冷、凉、温、热的定性区分。对于三个层次的访问数值，在评估时要综合考虑，但总理级以上互访的数值是最为看重的。

表 5 从各级高层互访的角度衡量中日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的参照值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政冷	0—1 次	0—2 次	0—3 次
政凉	1—2 次	2—3 次	3—5 次
政温	2—4 次	3—5 次	5—8 次
政热	4 次以上	5 次以上	8 次以上

资料来源：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 63 页。

在经济关系方面，这一衡量法主要选取三个指标，分别是中日贸易总额增长率、中日贸易总额增长率与中国外贸总增长率的比值，以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并同样设定了与经济关系冷热程度对应的参照值表（见表 6），将经济关系根据不同数值做出冷、凉、温、热的定位。并强调，如果遇到中日贸易数据与对华投资数据出现矛盾，则以中日贸易数据为主要参考项。

在根据数值对不同年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分别做出定位后，我们将二者组合便可得出该年度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复合定位，除了广为人知的“政冷经热”外，“政温经凉”等不同组合都是可能出现的。

表 6 从贸易和直接投资角度衡量中日经济关系冷热程度的参照值

	贸易增长率	中日贸易总额增长率与 中国外贸总增长率比较	日本对华投资 合同金额增长率
经冷	负增长	相当于平均值 30% 以下	负增长
经凉	停滞或低于 5%	相当于平均值 50% 以下	停滞或低于 10%
经温	5%—20%	相当于平均值 70% 以下	10%—30%
经热	20% 以上	接近、等于或高于平均值	30% 以上

资料来源：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 64 页。

（二）相关数据的搜集与处理

在选定定量分析模型的基础上，笔者对“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所需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搜集与处理。为了保证所得数据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准确性，笔者主要通过中日两国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或官方出版物进行数据的搜集。在经济关系衡量指标所需数据的搜集过程中，笔者发现，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日本外务省对中日贸易总额增长率的统计略有不同，但这对本文研究的影响并不大。同时，因为涉及与中国外贸总增长率的比较，而这个数据日本方面是不能提供的，因此笔者在中日贸易总额增长率数据的搜集中采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其出版物《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① 此外，本文研究所需的中国外贸总增长率数据来源为《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② 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则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③

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使用上，合同金额数据要比实际投入金额数据更有意义。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出现用设备折

① 中国方面的数据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日本方面的数据见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boeki.html>，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网站，<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trade/>。有需要或感兴趣的学者可以参考或验证。

② 中国知网年鉴数据库中提供 1990 年以来的《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③ 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d/cw/>。

抵资金的现象，从而使统计得到的实际投入金额少于合同金额。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对外资管控的逐渐放开，外资开始享有国民待遇，外资合同不再需要向中国商务部备案，从 2007 年起中国商务部已经不再进行合同金额的统计”。^① 因此具体衡量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一项，1992—2006 年使用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及增长率，2006 年以后使用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金额及增长率。

在以上前提下，笔者搜集整理的“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所需经济数据如表 7 所示。

表 7 1992—2013 年中日经济关系重要数据

年份	中日贸易 增长率 (%)	中国外贸 总增长率 (%)	与中国外贸 增幅比值 (%)	直接投资 合同金额 (亿美元)	合同金额 增长率 (%)	直接投资 实际投入 (亿美元)	实际投入 增长率 (%)
1992	25.0	22.0	113.6	21.7	167.9	7.1	34.0
1993	53.9	18.2	296.2	29.6	36.4	13.2	85.9
1994	22.8	20.9	109.1	44.4	50.0	20.8	57.6
1995	20.0	18.7	107.0	75.9	70.9	31.1	49.5
1996	4.5	3.2	140.6	51.3	-32.4	36.8	18.3
1997	1.2	12.2	9.8	34.0	-33.7	43.3	17.7
1998	-4.7	-0.4	—	27.0	-20.6	34.0	-21.5
1999	14.2	11.3	125.7	25.9	-4.1	29.7	-12.6
2000	25.7	31.5	81.6	36.8	42.1	29.2	-1.7
2001	5.5	7.5	73.3	54.2	47.3	43.5	49.0
2002	16.1	21.8	73.9	53.0	-2.2	41.9	-3.7
2003	31.1	37.1	83.8	79.6	50.2	50.5	20.5
2004	25.7	35.7	72.0	91.2	14.6	54.5	7.9
2005	9.9	23.2	42.7	119.2	30.7	65.3	19.8

① 此信息为笔者电话采访中国商务部外资司所得。

续表

年份	中日贸易 增长率 (%)	中国外贸 总增长率 (%)	与中国外贸 增幅比值 (%)	直接投资 合同金额 (亿美元)	合同金额 增长率 (%)	直接投资 实际投入 (亿美元)	实际投入 增长率 (%)
2006	12.4	23.8	52.1	99.1	-16.9	47.6	-27.1
2007	13.8	23.5	58.7			35.9	-24.6
2008	13.0	17.9	72.6			36.5	1.7
2009	-14.2	-13.9	—			41.0	12.3
2010	30.2	34.7	87.0			40.8	-0.5
2011	15.1	22.5	67.1			63.3	55.1
2012	-3.9	6.2	—			73.5	16.1
2013	-5.1	7.5	—			70.6	-3.9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其出版物《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72页；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

中日政治关系衡量指标，即中日各级高层互访次数的相关统计方面，刘江永教授已对1986—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过很好的统计。^①因此，对于本文研究所需的1992—2005年的部分统计数据，笔者在对刘江永教授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验证的基础上进行了借鉴，之后又根据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的《中国外交》年鉴及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对2006—201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提取和统计，完成了本文研究所需政治指标的补全。

对于中日高层互访次数的统计原则是：中国方面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的访日，以及日本方面的天皇、首相、参众两院议长的访华算作总理级以上高层访问；中国方面国务委员对日本的访问以及日本方面的首相特使的访华算作副总理级别的访问，中国副总理与日本外相进行的互动算作副总理级别的访问；所有访问均以直

①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61页。

接针对对方国家的访问为标准,不计在 G8、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中中日各级高层的交流互动。

在以上前提下,笔者搜集整理的“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所需政治关系数据如图 7 所示。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21 世纪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两次恶化和冰冷的时期。第一次是 2001—2006 年小泉执政时期,第二次是 2010 年中日发生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至安倍再度执政时期。量化分析与人们的感受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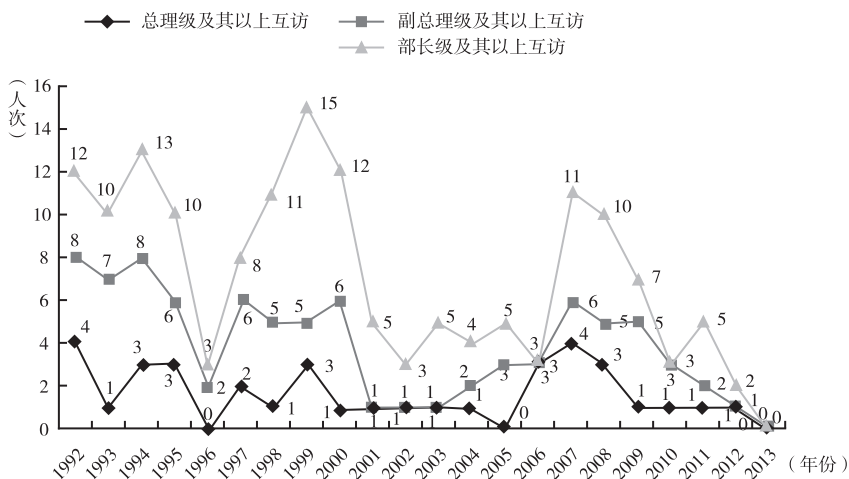


图 7 1992—2013 年中日两国部长级以上高层互访次数

资料来源: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 61 页;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的《中国外交》年鉴及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三) “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视角下中日政经关系状态

在完成对“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相关指标所需数据的搜集整理后,笔者将这些数据与“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设定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做了一一对应。比如,总理级以上访问次数小于 1 次为“政冷”,1—2 次为“政凉”,2—4 次为“政温”,4 次以上为“政热”;

而中日贸易增长率为负是“经冷”，停滞或低于5%为“经凉”，5%—20%为“经温”，20%以上为“经热”等。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衡量。

以2006年为例，全年只有3次部长级以上互访，根据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的参照值（见表8），最乐观的情况也只能算为“政凉”，但这3次访问都是总理级以上的，分别是安倍晋三上任后的“破冰之旅”，以及日本参议院议长扇千景和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分别访华，体现了日方对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以及中日关系升温的迹象。因此，笔者认为，应该采取总理级以上互访2—4次以上为“政温”的衡量标准，将2006年的中日政治关系算作“政温”。而2009年，当年总理级以上、副总理级以上以及部长级以上的访问次数分别为1、5、7。如果严格按照总理级以上互访的影响系数更大的原则，对照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的参照值，则最乐观的情况也同样只能算是“政凉”，但因为这年7次部长级以上访问中有5次是副总理级别以上（4次是副总理级别、1次是总理级别），而副总理级别的政治活动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笔者同样将2009年的中日政治关系衡量为“政温”。同样道理的还有1993、2000年等。

表8 从各级高层互访的角度衡量中日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的参照值

	总理级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以上互访	部长级以上互访
政冷	0—1次	0—2次	0—3次
政凉	1—2次	2—3次	3—5次
政温	2—4次	3—5次	5—8次
政热	4次以上	5次以上	8次以上

资料来源：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63页。

至此，笔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运用“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对冷战后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历年来的状态得出如下界定（见表9）。

表 9 1992—2013 年中日历年政经关系温差一览

单位：人次，%

年份	总理级及其以上互访	副总理级及其以上互访	部长级及其以上互访	政经温差		中日贸易增长率	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合同金额增长率	实际投入增长率
1992	4	8	12	政热	经热	25.0	113.6	167.9	34.0
1993	1	7	10	政热	经热	53.9	296.2	36.4	85.9
1994	3	8	13	政热	经热	22.8	109.1	50.0	57.6
1995	3	6	10	政热	经热	20.0	107.0	70.9	49.5
1996	0	2	3	政冷	经凉	4.5	140.6	-32.4	18.3
1997	2	6	8	政温	经凉	1.2	9.8	-33.7	17.7
1998	1	5	11	政温	经冷	-4.7	—	-20.6	-21.5
1999	3	5	15	政热	经温	14.2	125.7	-4.1	-12.6
2000	1	6	12	政热	经热	25.7	81.6	42.1	-1.7
2001	1	1	5	政冷	经温	5.5	73.3	47.3	49.0
2002	1	1	3	政冷	经温	16.1	73.9	-2.2	-3.7
2003	1	1	5	政冷	经热	31.1	83.8	50.2	20.5
2004	1	2	4	政冷	经热	25.7	72.0	14.6	7.9
2005	0	3	5	政冷	经温	9.9	42.7	30.7	19.8
2006	3	3	3	政温	经温	12.4	52.1	-16.9	-27.1
2007	4	6	11	政热	经温	13.8	58.7	—	-24.6
2008	3	5	10	政热	经温	13.0	72.6	—	1.7
2009	1	5	7	政温	经冷	-14.2	—	—	12.3
2010	1	3	3	政凉	经热	30.2	87.0	—	-0.5
2011	1	2	5	政凉	经温	15.1	67.1	—	55.1
2012	1	1	2	政冷	经冷	-3.9	—	—	16.1
2013	0	0	0	政冷	经冷	-5.1	—	—	-3.9

资料来源：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的《中国外交》年鉴及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其出版物《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商务部网站。^①

① 1992—2005 年数据主要参考刘江永教授在《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一书中整理的数字，笔者进行了一定修正；2006 年及以后数据系笔者整理。

五 中日政经关系温差现象中的事实与规律

（一）冷战后“政经分离”政策的重提是无效的

目前，中日两国社会中很多人都知道“政经分离”的提法，这既是因为冷战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政冷经热”等形式的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温差的长期存在，也是因为 2005 年安倍晋三首相首次当选前将“政经分离”作为一项对华政策公开提出，并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① 2013 年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这一政策又再次引起了中日两国社会的广泛关注。^②

但是，和目前人们熟知的“政经分离”政策不同，实际上最初的“政经分离”原则是战后初期日本政府为维系与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的关系平衡，同时满足日本内阁的政治主张和日本民间人士和团体的对华贸易需求而提出的权宜之计。^③ 二战结束不久，日本民间的经济界人士便希望能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绕开政治对立的限制，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活动，而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借此来突破西方国家对新生政权的封锁禁运。1952 年日本与中国台湾签订“日台条约”后，为同时分别与国民党台湾保持政治关系、与共产党大陆保持经贸联系，逐渐将“政经分离”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然而 1957 年岸信介内阁成立后，在“政经分离”的政策掩护下，日本在政治上对中国台湾的迎合更加明显，这让中国大陆方面意识到“政经分离”政策对中国政治利益的损害，开始转而主张中日“政经不可分”原则，并提出了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政

① [日] 安倍晋三：《促使中国政经分离》，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005 年 7 月 3 日，<http://www.nikkei.co.jp/news/seiji/20050703AT1E0300A03072005.html>。

② 《专家称安倍对华路线“政经分离”，手段软硬结合》，中国新闻网，2013 年 7 月 25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7-25/5084243.shtml>。

③ 高世鹰：《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治三原则”。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中日两国都存在着是“政经分离”还是“政经不可分”的争论。随着 1972 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在政治方面的分歧已不存在，“政经分离”原则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安倍晋三于 2005 年开始重新主张的“政经分离”的提法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原则是有本质区别的。邦交正常化前日本政府所主张的“政经分离”原则的实质是“两个中国”政策，这种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地位的争论在冷战后已经不存在了。安倍晋三首次重提“政经分离”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国不应该使政治问题波及经济，以谋求达到目的。如果不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分离，就不能建立稳定的关系。”^① 此后不久，小泉纯一郎在回应日本经济同友会关于为避免对中日经贸产生负面影响而希望其对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慎重考虑时，小泉认为“那（经贸）与政治是两回事”，因此“明确拒绝”。^② 这也就是说，进入 21 世纪之后日本政界重提中日关系“政经分离”的目的，是为了在坚持日方与中方不同的政治主张、采取与中国政治对抗政策的同时，希望中日的经济关系能保持正面的、积极的发展态势，也就是“中日政治关系尽管不睦，但日本仍可借助中国市场大大获益”。^③

根据冷战后中日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定性判断，我们将其描绘成图 8 的形式，以观察其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1996—1997 年，中日政治关系上升，而经济关系维持在低水平不变；1997—1998 年，政治关系不变，经济关系下降；2001—2004 年，中日政治关系持续低迷，而经济关系持续繁荣；2005—2008 年，中日政治关系持续上升，而经济关系没有实质性突破；2009—2010 年，中日政治关系下降，而经济关系上升。

① [日] 安倍晋三：《促使中国政经分离》，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005 年 7 月 3 日，<http://www.nikkei.co.jp/news/seiji/20050703AT1E0300A03072005.html>。

②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 17 页。

③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点，见《安倍政经分离思维将影响中日经贸合作》，中国新闻网，2013 年 8 月 8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8-08/5138911.shtml>。

客观而言，这些变化似乎是杂乱无章的：政治关系好或变好，经济关系可能变好（1998—2000年），也可能变坏（1996—1998年），还可能在高水平或低水平保持（1992—1995年、2005—2008年）；政治关系坏或变坏，经济关系可能变好（2009—2010年），也可能变坏（1995—1996年、2010—2012年），还可能维持在一定水平不变（2001—2005年、2012—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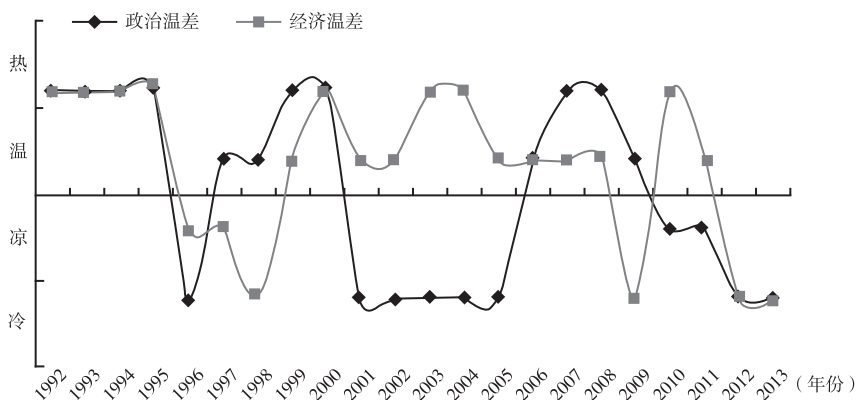


图8 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温差曲线

就小泉首相任内而言，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确实保持了较大温差，好像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分开运行的，但如前所言，“政冷经热”这种“政经分离”的理想结果只是小泉任内的特殊现象，之前不曾出现，之后也几乎未再出现过。从冷战后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整体看似“杂乱无章”的发展脉络来看，安倍晋三或其他日本领导人如果认为中日的政治经济关系可以完全分离，而且无论日本在政治上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中日经济关系都能良好发展，这无疑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可以说，如果日本政府重提“政经分离”并想以此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原则，那一定会是无效的。

（二）政治、经济各行其道是中日政经温差现象的根源

实际上，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也并非“起伏不定”和“杂乱

无章”的，而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如果以图8所反映的数据为基础，把冷战后中日经济关系的“温度”曲线做平滑处理，则可以得到图9所示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中日经济关系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的：1992—2004年的“经热”阶段、2005—2011年的“经温”阶段，以及2012年开始的“经冷”阶段。当然，在这三个阶段中都各有起伏与反复，比如在“经热”阶段中有1996—1998年中日经济关系的下降，并且1998年一度出现“经冷”状态，而这种经济关系的最差状态在冷战结束后至2012年前只出现过2次；同时，在“经温”阶段也有2010年的“经热”状态。然而，这些波动大多不是中日经济关系本身变化造成的，而是受到政治事件或区域、世界的整体经济环境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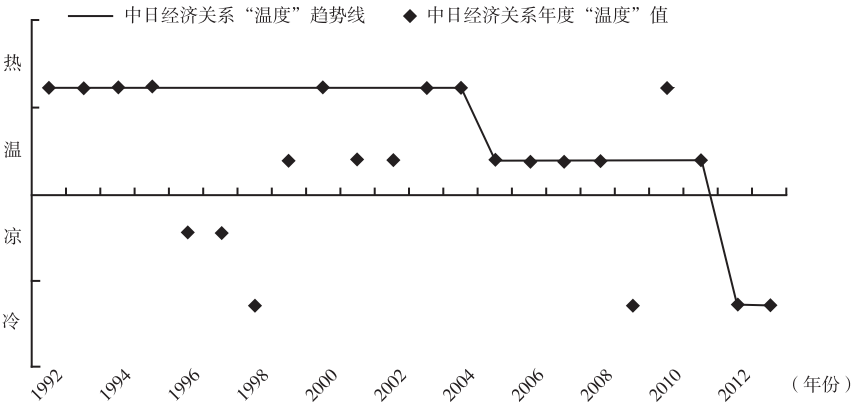


图9 中日经济关系“温度”趋势

具体而言，1992—2004年，中日经济关系整体表现为“经热”状态。其间，1996—1999的经济“温度”低于整体趋势，1996、1997、1998三年的经济“温度”更是处于“经凉”或“经冷”的水平。1996年中日经济之所以变凉，一是受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中日钓鱼岛领土纠纷等负面政治事件的影响，另外也有很大部分原因是1996年中国

接连进行核试验以及台海危机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① 1996 年，中国总的外贸增长率仅为 3.2%，而中日贸易增长率为 4.5%，也就是说中日贸易增长率与中国外贸增幅的比值达 140.6%。由于在“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相关指标中，双边贸易增长率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也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参照值，那么在这个意义上，1996 年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可以归为“经热”状态。而 1997、1998 年中日经济关系由“凉”到“冷”的原因众所周知，爆发于 1997 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中日经济关系迅速从 1998 年的“经冷”恢复到了 1999 年的“经温”，以及 2000 年的“经热”。这也再次证明了，冷战结束后到 2005 年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整体趋势是保持“经热”状态。

2005—2011 年，中日经济关系整体表现为“经温”状态，其间有两次比较明显的波动，分别是 2009 年的“经冷”以及 2010 年的“经热”。这一阶段，中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这种经济成就的基础上萌发了崛起意识，^② 日本的经济则没有特别的起色。虽然小泉时代中日经济仍然持续了火热的联系，但这种状态可能已更多的是一种惯性和延续。实际上在小泉时代，中日经济关系便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 2003 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越，降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③ 而中国则在 2005 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2 年日本政府“购岛”事件发生后，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采取了对对方的制裁和抵制措施。在中国方面，日系品牌在华销量大幅衰退，中国大量旅客取消了赴日旅游；在日本方面，日本民间也减少了对中国资

① 罗洁、刘江永：《“分秒融冰”的 52 小时》，《世界知识》2007 年第 9 期。

② 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2003 年 12 月 10 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2/11/content_1224824.htm。

③ 《日本降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新浪网，2004 年 10 月 15 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41015/10511082254.shtml>。

产的投入，日本赴华旅游人数也大幅下降。^① 在接下来的 2012 年和 2013 年，中日贸易分别负增长了 3.9% 和 5.1%， “政冷经冷” 现象终于在冷战结束后第一次真正出现。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也是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整体中的地位则日益下降（见图 10），2011 年，日本被东盟超过，降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 年日本被中国香港超过，降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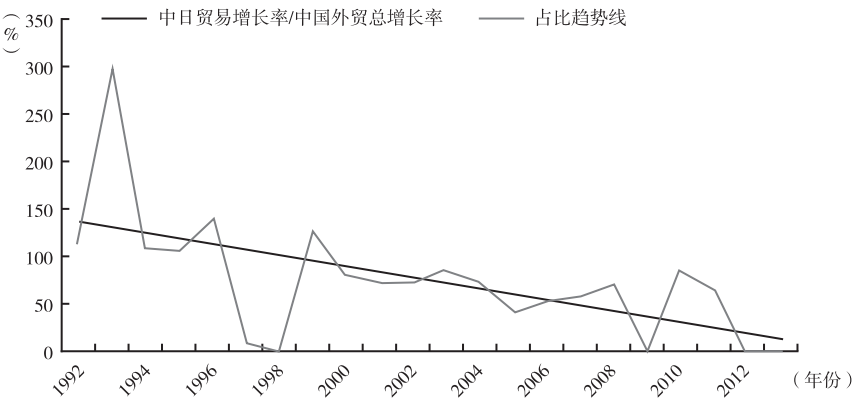


图 10 中日贸易增长率与中国外贸增幅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其出版物《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整理。

六 总结

纵览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脉络，我们发现，政治事件的负面影响在不同阶段对“政冷经冷”现象的影响不同。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效果是以经济关系的整体走势为基础的。当经济关系本身处于“经热”

^① 见凤凰网专题《钓鱼岛争端波及中日经贸》，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maoyizhan/?_newshao123。

阶段时，政治关系的良好发展会为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便利和保障，进而促进经济关系更好地发展；而政治关系的负面发展或是不对经济关系的整体走向造成影响（如小泉首相时代），或是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能迅速消除并恢复（如20世纪80年代的三次“政冷经冷”现象），也就是说，促进作用可能没有，但阻碍作用也不会太大。当经济关系本身处于“经温”或是更低的阶段时，政治关系的良好发展可以避免对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或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无法对经济关系的整体走向产生根本性影响（如2006—2008年的中日经济关系）；而政治关系的负面发展则会更容易阻碍经济关系的发展，或造成更加严重、持久的负面影响（如2012年“政冷经冷”现象的出现及持续）。

以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三次“政冷经冷”现象为例，虽然如上所述都与中日负面政治事件相对应，但同样不能忽略其背后的经济因素。1982年中日第一次“政冷经冷”现象的出现，除了受铃木内阁时期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事件的影响，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国80年代初对自身经济过热的主动调整。当时中国为了给经济降温，不得不停建或缓建某些较大的工程项目，并在进口方面采取紧缩政策，其间甚至有人试图中止宝钢中日合作项目。1986—1987年中日第二次“政冷经冷”现象的出现，除了受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影响，同时也有中国为了避免对日贸易逆差过大，实现贸易平衡而再度控制进口的影响。1989年的中日第三次“政冷经冷”，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是一方面，同时也深受中国经济整顿治理，实行财政信贷双紧缩方针以及抑制国内需求的影响。^①

小泉时代中日“政冷经热”的现象表明，当时中日经贸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负面政治事件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不大，并没有出现“政冷经冷”的现象。例如2005年，即便中国因为日本教科书和“入常”问题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日事件，也依然保持了“经温”的状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经济需求相应降低。可以肯定的是，

① 参见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53—55页。

目前中日经济本身的联系,已经不足以像 2005 年以前一样无视政治关系恶化的影响。相比于以往,负面的政治事件更容易使经济关系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从 2012 年下半年以来,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政冷经冷”现象已经持续近两年时间。这是此前 20 世纪 80 年代中日关系所发生的三次“政冷经冷”现象以及冷战后屡次经济关系下行时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以往的“经冷”或“经凉”现象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此次“政冷经冷”现象会何时结束,结束以后是恢复到“经温”的状态,还是进入长期“经凉”的状态,以及今后中日政治关系的“冷、热、温、凉”与经济关系的“温、冷、凉”将如何组合出现,都有待进一步观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经济 2010 年才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短短三年时间内 GDP 已达日本 2 倍^①的背景下,如果中日政治关系不能有所改善,那么“政冷经冷”现象的出现将会越来越频繁,持续的时间将会越来越长。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有相似的判断,如有学者曾指出,“经热”是中日共同利益使然,“政冷”是中日利益冲突使然。张季风也曾认为,在中日双边经贸合作中,无论是贸易领域还是投资领域,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其内在的市场机制。政治关系的变化只是外因,对传统贸易和民间直接投资影响不大。^② 本文则是以定量研究的结果为依据,从中日经济关系整体发展的“阶段”属性决定论的视角,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新的解释。

① 《13 年の GDP 中国が日本の 2 倍に》,财经新闻网站,2014 年 1 月 21 日, <http://www.zaikai.co.jp/article/20140121/173800.html>。

② 王小波:《中日博弈“政冷经冷”底线》,《经济参考报》2006 年 1 月 9 日,第 2 版。